

家庭教育投入问题研究述评

蔡 玲

摘要：家庭作为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境，父母的养育过程对儿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关子女教育问题对家庭产生的影响日益成为社会各届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不仅包括家庭在整体教育投入中所承受的经济型负担，还包括由于密集型教养方式带来的非经济型投入。通过对当前学术界有关家庭教育投入的概念与影响因素的细致梳理，发现对于家庭教育投入的探讨主要为“经济型投入”与“非经济型投入”两种分析维度，其中家庭所具有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要素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关键性因素。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采用组合视角对家庭教育投入进行更加全面、整合性、历时性、动态性的描述，分析新时期我国家庭教育投入所具有的总体性、结构性特征以及投入偏好的历时性变化；第二，采用具有全国性的跨期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可以准确反映当前家庭教育投入总体状况的结论；第三，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对家庭教育投入的机制与过程做更为细致的考量，对比不同阶层家庭在教育经济性支出和非经济性教育投入上的异质性，分析家庭资本的累计与转变在不同阶层间影响其家庭教育投入的内在机制，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家庭教育投入；经济型投入；非经济型投入；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 (2022) 02-0068-1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①家庭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环境，父母的养育过程对儿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关“工之子恒为工？”、“寒门再难出贵子？”及类似的话题不断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家庭对子女教育产生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对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投入问题的认识也逐渐从对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关注转变到从家庭维度分析教育公平问题。

本文从社会学学科视角，梳理当前家庭教育投入的界定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更加清晰地勾勒出当前家庭教育投入的基本貌相，为进一步

分析家庭教育投入影响机制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经验，有利于推动家庭教育和社会分层的深入研究。

一、家庭教育投入的界定及分析维度

（一）家庭教育投入的界定

在学界，家庭教育投入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有学者将其称为家庭教育投资，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家庭教育投入。当前学界对家庭教育投入内容、范围的界定和分类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结论^②，绝大多数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分类^③。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在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家庭教育投入往往专指家庭为子女支出的教育费用，有关家庭教

育投入的内容和分类的讨论主要围绕家庭教育中涉及的经济性投入。

随着对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投入问题的认识也逐渐从对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关注转变到从家庭维度分析教育公平问题,特别是家庭教育投入的社会学研究将社会文化背景、家庭阶层地位、家庭资本占有等社会性因素纳入分析框架,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有效捕捉各阶层家庭因经济与教育优势的不同而存在的教育公平阶层化差异。

因此,家庭教育投入是一个多元的概念,指父母为子女提供一系列教育资源、学习活动、受教育机会的行为,既包括物质性投入、教育支出在内的货币性投入,也包括父母的教育观念、抚养时间与精力等非货币性投入^④。

(二) 家庭教育投入的分析维度

1. 家庭教育经济型投入: 家庭教育支出

家庭教育经济型投入也可以理解为家庭教育支出,代表的是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家庭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投入的重要来源,对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不仅可以满足暂时的需要,还能帮助子女通过知识、技能等方面人力资本的获得与积累,提高家庭未来的收益,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⑤。

现有的研究文献将家庭教育支出划分为以下类型:第一类,从家庭教育投入的个体性差异入手,根据教育消费的必要性和非必要性,将家庭教育支出划分为基本教育支出、扩展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三类^⑥。其中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校服费等属于基础性教育支出;补课费、兴趣班费、家教费、课外书费、学习用具和电子产品费等属于扩展性教育支出,择校费和赞助费是选择性教育支出。第二类,根据教育经费的投入领域差异,将家庭教育投入区分为“校内投入”与“校外投入”,如将学杂费、食宿费等费用界定为校内投入,而将校外培优费、培训费、兴趣班、择校费等费用全部界定为校外费用^⑦。第三类,专注于家庭教育投入回报率,将个人教育投资成本区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⑧,其中直接成本多指家庭付给学校的学费、考试费、注册费等费用,间接成本则指购买教材、文具、交通等方面的费用。

2. 家庭教育非经济型投入: 从家庭教育时间到家庭教养实践

随着对人力资本认识的不断加深,有学者开始认识到家庭为子女进行的教育投资不限于经济性支出,家庭在育儿实践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另一种重要投入。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时间的投入与金钱上的投入具有同等作用^⑨,家长可以通过在陪伴学习和活动等时间上的投入影响子女教育,有助于传递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孩子形成良好的世界观^⑩。社会学研究发现,在对子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及学业成绩的影响上,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在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发挥着可能较经济型投入更加重要的作用^⑪。总之,在家庭教育非经济性投入的研究中,由于时间具有可量化的特征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界也逐渐发现仅仅是时间“量”上的累积,可能不能完全洞察出家庭在教育投入“质”上的差别,难以全面回答家长优势是如何传递到子女学业成就的机制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不断有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教养实践是指在某种教养方式下所进行的育儿实践行为。如果说家庭教育支出体现的是家庭的经济能力,那么家庭教育非经济性投入,即在某种家庭教养方式下所实施的教养实践行为所表现的则是家庭文化环境下的重要文化资本。在相关经验研究中,拉鲁指出的教养方式的两种理想类型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⑫。目前,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对教养方式的分析主要包括教养观、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三个维度。

从教养观来看,学者们较为关注其体现的阶层差异,认为家长对自己与孩子关系的定位是造成教养观阶层差异化的主要根源。多数学者认同协作培养侧重于对孩子自主性的培养,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家长的核心责任在于与孩子建立较好的情感联系,并将教养孩子本身视为自我发展的一种经历。自然成长强调对孩子服从性的培养,家长往往视孩子的成长为自身生命的延续,平时较为注重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⑬。

从亲子互动方式来看,协作培养注重“沟通”,自然成长强调“命令”。由于协作培养注重情感联系,因此倡导这一教养方式的家长与子女间关系往往较为亲密,倾向于与子女进行理性沟通,多为权威型家长;自然型成长通常与孩子的沟通以命令为主,不注重情感互动,亲子关系较为疏远,往往是

专制型家长^⑩。

从能力培养方式来看,主要包括家校互动方式与课外活动的组织形式。对于家校互动方式,部分研究借鉴了科尔曼的社会闭合理论,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父母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对孩子学业成就具有积极影响。协作培养强调家长在家校互动中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积极参加学校活动,理解并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多与老师沟通等;自然成长则主张孩子的教育应由学校负责,家长通常较为被动的听从老师指令。从课外活动组织形式的研究中发现,协作培养较为重视孩子的综合能力培养,特别是孩子对高雅艺术的鉴赏能力和运动能力,而自然成长多重视课业成绩,对课业以外的活动并不太关心^⑪。有学者指出这一差异性在暑假期间表现尤为明显,协作培养的家庭会给孩子尝试很多兴趣班,旨在培养艺术、人文、科技等方面的兴趣,而自然成长家庭的孩子则常在假期无所事事,花费很多时间在看电视上^⑫。

显然拉鲁提出的两种教养方式代表着不同的家庭教育非经济性投入的力度,其中“协作培养”往往需要花费父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国学者对家庭教养实践的研究主要从家庭文化环境与家庭教养理念两个方面进行。刘保中以家庭文化环境、孩子参与志愿者活动等作为测量家庭教育非经济性投入的指标,对中国特大城市的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家庭进行比较研究^⑬;刘浩将家庭教养实践的内涵划分为三个层面:父母与子女的交流互动、安排孩子参与有组织的业余活动、父母参与儿童的学习和生活^⑭;洪岩璧和赵延东从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出发,将惯习作为因变量代表家长的教养理念,将文化活动参与情况、家中藏书代表家庭文化资本,对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进行家庭教育非经济型投入分析^⑮。

二、家庭教育经济型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教育事业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⑯在教育规模逐渐扩大、教育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以及教育经费大幅提高的同时,教育投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般来说,教育的投资结构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投资和家庭的私人投资构成,中国在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的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全国生产总值4%的目标,最终在2012年得到实现。在公共教育投资不足的背景下,一方面,家庭教育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教育支出的不足;另一方面,家庭因教育支出的逐渐上升也承受了较大的经济压力。

(一) 家庭收入

家庭教育经济型投入的影响因素较多,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收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⑰。Knight和Shi基于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当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00元,就会相应增加1.2元在子女教育消费上。然而,并非所有的家庭在提高家庭收入后在教育消费上具有同样的增幅。经济学家Benson运用经济学概念“收入弹性”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他发现家庭收入不同导致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表现出不同的收入弹性,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支出弹性最大,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支出增加幅度也相对最大。随后,有学者运用日本的数据对这一研究结论做了进一步论证,并指出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大于0时,家庭收入变动对家庭教育支出变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⑱。

中国本土的研究也证实了家庭经济水平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如谷宏伟和杨秋平通过在中国东、中、西不同地区发放1800份问卷,发现家庭收入和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影响其家庭教育支出的显著性指标^⑲;李亚伟和刘晓瑞基于CHNS数据,对中国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性影响^⑳。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当家庭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看法不同时,其家庭经济条件与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也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中国家庭在教育投入上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但同时也关注“幸存者效应”,即较高地估计教育可能带来的远期回报,因此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呈现为U型曲线,即家庭教育支出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而不断增大,但当教育支出达到一定高水平后,家庭教育支出将不会继续增加^㉑,也就是说家庭在教育支出上存在一个上限,高收入家庭虽然收入较高,但如果已经达到上限也不会继续提高教育支出,而低收入家庭则会努力提高家庭教育支出以接近这一上限^㉒。

(二) 子女数量

最初由Blake提出,后被Downy进行拓展研究

的资源稀释理论针对家庭教育投入提供了理论解释框架,该理论认为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家庭子女数量的影响。因为在家庭总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子女数量越多,分摊到每个孩子的货币资本就越少。一些经验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 Lee 的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和子女抚养质量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且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这种反向关系表现得越明显;在东亚的一些大家庭中,家长以牺牲年长女孩的教育机会为代价,将较多的资源留给家中的男孩^⑦。

此外,贝克尔和 Lewis 都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提出孩子“数量—质量”的替代理论,他们认为家庭的资源配置受到孩子数量的影响,生育孩子与抚养孩子之间存在着数量和质量相互替代的关系。在父母照顾子女的时间以及家庭收入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家庭宁愿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来提高抚育孩子的质量,通过加大在孩子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⑧。中国本土的研究因调查对象的不同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龚继红和钟涨宝在对农村地区的调查时发现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多,家庭更倾向于让未升学的孩子直接转变为家庭劳动力,而随着家庭子女数减少,选择继续接受教育的家庭则明显增多^⑨。谷宏伟和杨秋平通过在中国东、中、西不同地区发放 1800 份问卷,发现家庭教育支出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多而增多^⑩。

(三) 性别观念

群体文化观念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Hofstede 认为,文化是一种心理的集体性编程,它将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人群区分开来。因此,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下,人们的行为和态度都会受到较为明显的影响。Qian 和 Smyth 的研究发现与家庭中其他形式的消费不同,家庭教育支出多少以及如何分配不仅受制于家庭的经济预算的约束,还受到代际资源转移偏好的影响^⑪。

在影响家庭代际投入的文化观念中,性别观念尤为重要。特别是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家中往往得到边缘化待遇。有学者通过对越南的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对女孩的教育支出弹性高于男孩,表现为只有当家庭经济收入较为富足时才会为女孩在教育上投入。Lee 在对日本的 45 位家长进行结构性访谈后发现,除了家庭经济收入之外,父母的性别信仰和教育价值评估也是影响其对不同性别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⑫。此外,有学者进一步发现虽然经

济发展和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两性之间的教育平等,但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却可能让父母更加平等地对待不同性别子女在教育资源上的分配^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孩偏好”、“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多子女家庭存在男孩投资偏好,而当家庭整体收入提高,特别是突破了投资子女教育的资源瓶颈时,家庭中的男孩与女孩会平等地享有家庭的教育资源^⑭。

(四) 地域

在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影响因素中,城乡差异以及地区性差异等地域因素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已有的研究发现,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制度性分割导致的城乡发展水平极不均衡,使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都远低于城市地区^⑮。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课外辅导市场发展缓慢等因素进一步反映在家庭教育支出上,如有学者在对上海市的居民家庭进行调查后发现,同样是家庭中有在小学、初中、高中读书的孩子,城市家庭花费在教育上的开支分别是农村家庭的 1.95 倍、1.34 倍和 1.52 倍^⑯。

在地区差异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研究中,李红伟利用 1999 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15 万户城镇居民的家庭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不同地区居民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经济越发达地区的家庭投资越多,但同时由于这些地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总体支出也相对较高,因此反映到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率上则相对较低;与之相反,虽然在贫困地区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对数额并不很高,但是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消费中的比重较高,家庭教育负担较重,不仅影响了家庭整体生活质量,还制约了这些家庭在教育投资上的意愿^⑰。

(五) 父母受教育水平

在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诸多因素中,父母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在对土耳其等国家的研究分析中发现家庭教育支出与父母受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这一经验发现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验证,有学者通过对 CHNS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证实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其增加子女教育支出,且这一特征在城乡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⑱,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为子女在校外教育上花费更多,且从家庭教育的代

际传递看，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更为重要^⑨。

(六) 公共教育支出

作为我国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教育支出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能否正常、稳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有学者指出虽然公共教育投入与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并不是属于同等性质和类别的教育经费来源，但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个体的教育投资决策会产生一定影响^⑩，然而这种影响究竟是“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学者们的观点莫衷一是。Tilak 运用印度数据分析发现，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挤入效应”；Das 等运用赞比亚、印度两国数据分析时发现，家庭对政府教育支出会提前有预判，当他们认为政府会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时，就会相应减少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反之则会提高家庭教育支出；Glomm 和 Ravikumar 运用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发现，政府公共教育的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可能产生替代关系也可能形成互补关系，其中替代关系有助于减少教育不公平，互补关系则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随后 Nordblom 通过理论分析对这一实证结果予以证明，并进一步指出当替代效应在不同收入家庭中分布不同时，就会严重损害公共教育的公平性^⑪。

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经验理论探索，孙敏通过对样本区间介于 1991—2007 年的相关数据，以财政性教育投资与非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增长率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教育投资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从短期看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可能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但从长期看则有挤入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在此项研究中，作者是将学校资金来源中的非政府投入作为家庭教育支出，而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⑫。袁诚等运用相关横截面数据对这一不足进行了弥补，指出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有较为明显的“替代效应”，且在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之间分布不均匀，对中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⑬。

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⑭。近 20 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率均基本保持在 10% 以上。然而在教育经费总体增长的背后，我国公共财政预算中生均教育事业费的分布依旧是“重高轻基”，与高等教育中教育经费总量的 80% 来自政府相比，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经费只有 60% 来自

政府拨款^⑮。与此同时，由于区域间经济和社会存在较大差异，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分担比例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导致各省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各不相同，加之户籍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在省份间的自由流动，教育资源的省际间差距依旧十分明显^⑯，公共教育投入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在当前公共教育投入存在总体投入不足与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的背景下，家庭在子女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投资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最重要因素，同时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也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诸多文献研究中指出目前中国依旧存在明显的地区性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城乡之间、省际之间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公共教育投入上都差距很大，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和地区间的分布也不均衡。

目前国内对于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与充分，具体表现为：

第一，有关家庭教育支出的全国性数据较少，多数研究是基于地方性样本进行分析，且由于目前对家庭教育支出尚未有较为一致的界定，造成了研究结论不一致、且难以比较的情况。如在家庭经济收入和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作用上，谷宏伟和杨秋平的实证分析就与龚继红、钟涨宝以及杨珍、张倩的研究结论相左；在针对城乡户籍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的研究中，蔡宏波、李昕宇的研究结论和楚红丽的研究结论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项目和门类进行详细界定，并通过全国性的数据进行检验。

第二，目前有关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多从微观层面关注社会阶层地位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作用，如家长教育程度、家长职业、家庭经济收入等不同变量对教育支出的具体影响，忽略了公共教育支出、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竞争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可能影响，从而难以准确、全面地分析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

三、父母阶层等因素影响家庭教育非经济性投入

近年来中国家庭的亲职论述较以往有了很大的

转变。首先，亲子关系从侧重于传统孝道规范下的社会交换向强调亲子关系的情感满足转变；其次，父母角色从单一管教孩子的执行者向科学育儿的学习者转变；第三，在多年素质教育改革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教育方式上从过去“填鸭式”向注重孩子的个性、品行等多元综合素质培养转变。亲职论述的时代转变与近年来学界对人力资本认识的不断加深息息相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家庭为子女进行的教育投资不限于经济性支出，除了经济性投入外，父母在育儿实践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另一种重要投入^④，家庭教养方式及教养实践的相关研究也随之从最早的心理学区逐渐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

（一）父母阶层

父母阶层如何型塑其教育期待和教养方式并影响子女的未来成就等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学者对社会阶层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社会选择性视角和社会因果视角。前者认为诸如智力水平、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对家庭教养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后者则认为个体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决定了其家庭教养方式。随后也有学者将上述两种研究视角进行综合，在分析模型中同时考虑了选择机制与社会因果机制^⑤。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目前在社会阶层与教养方式关系的分析上主要存在两种分析路径：结构主义路径与个体主义路径。

结构主义路径主要探讨社会阶层作为结构性要素对教养方式的整体性影响，如建立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拉鲁的“协作培养”理论基础上的相关实证性分析，主要考察社会阶层的整体指标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在此研究路径下，社会阶层地位常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以及位置差异与家庭教养方式差异间存在的对应性关系。林德夫妇对不同阶层家庭教育目标的研究发现，劳工阶层的父母认为孩子的“服从”性品质十分重要，商人阶层的父母则更为重视孩子个体的“独立性”。布朗芬布伦纳的研究指出，在亲子关系上中产阶层家庭更为民主与平等，而劳工阶层则注重服从与规则。在家长与儿童进行语言互动过程中，伯恩斯坦的语言符码理论发现，中产阶层家庭倾向于使用精致性语言符码，从而能够更为精准的传递信息与自我表达，劳工阶层则往往使用限制性语言符码^⑥。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认为，阶层是具有相似资本的个体在社会场域中占据的位置，处于相同阶层的人不仅具有类似的惯习与品位，且具有相似的社会实践，反映到个体身上就是阶层差异化的生活方式。秉承布迪厄阶层理论，安妮特·拉鲁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中提出“自然成长”与“协作培养”两种教养方式，对应不同的阶层家庭，其中劳工阶层家庭采取的是“自然培养”模式，中产阶层家庭采取的是“协作培养”模式，并分别从养育责任观念、家庭语言模式、儿童课外活动安排以及家校合作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⑦。后续的诸多研究都建立在拉鲁的理论模型上，采取实证方法对其进行论证。在对阶层进行操作化测量时，霍林希德指数、邓肯社会经济指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一些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数常被用来作为测量指标。这些实证研究进一步印证了拉鲁的理论模型，证实了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在与孩子进行沟通的方式、对孩子的惩戒方式、情感回应等教养方式上有较大差异，有利于从整体层面理解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

相对于结构主义分析路径，个体主义路径则更加关注社会阶层地位作为个体或家庭禀赋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如家长教育程度、家长职业、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社会资本、流动的方向等不同变量对教养方式的具体影响。

1. 家长受教育程度

有关家长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主要来自于教育的非经济回报理论。在人力资本视角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不仅更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获得较好的市场回报，还能获得其他非经济性回报。其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对教养方式的作用就是教育非经济性回报的表现之一^⑧。诸多研究业已证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权威型、宽容型教养方式正相关，与专制型教养方式负相关，其中表现在母亲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尤为明显。例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在亲子沟通上通常会有更多的情感表达，在语言交流上提供明确的信息并给予孩子更多的语言刺激，在敏感性与情感支持上得分较高^⑨。在对孩子的惩戒方式上，不同的学者获得的结论有所不同，有研究显示父母的惩戒态度并不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其可能的根源在于成人的惩戒态度受到个体的人生经历影响相对较大，但也有描述性统计表明，无论家庭收入如何，

对“有时狠狠地打孩子屁股来惩戒孩子是十分必要的”的看法表示十分赞同的家长中，上过大学的家长比例显著偏低^③。

在探究家长受教育程度影响教养方式的原因分析中，学者们提出了如下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通常也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决策能力，会适时根据不同阶段的儿童发展需要调整自身的养育时间和策略，因此更易选择兼具挑战性与高效性的教养方式，如权威性教养方式。第二种，认为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体的非认知能力。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往往更具有耐心，看待问题更为深入，擅长前瞻性决策，因此更可能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做出有助于孩子的长远性规划并避免采用风险性相对较高的教养方式^④。

2. 家长职业

伴随着女性就业率上升以及双职工家庭大量出现，家庭分工模式慢慢地为人们熟悉与认可，孩子在家庭中才逐渐得到父母的关注。目前，关于家长职业对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视角：工作社会化视角与工作—家庭冲突视角。

工作社会化视角主要强调工作本身对个体能力、价值观以及信念等方面的影响，认为复杂性工作本身有助于提高家长的智力灵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⑤，个体通过工作中塑造的信念与价值观会进一步影响其教养观念与实际的教养行为。社会学家梅尔文·科恩最先从工作社会化的角度对家庭教养方式展开研究，他认为家长的职业类型会影响其价值观，进而对教养观产生作用，不同阶层的群体由于其工作状况和工作需要的不同产生出相异的价值观取向，从而反映到家庭教养方式上也大相径庭。具体而言，科恩认为劳工阶层的工作较为常规化，在工作过程中也常被要求服从命令并受到严格的规范化管理。顺从、遵守规则的职业特点造就了劳工阶层遵守外部权威的价值观取向，反应到家庭教养实践中，这一阶层的家长通常更加注重礼貌与服从性。与之相反，中产阶层的职业常规化程度较低，对创新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要求相对较高，同时可能经常面临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职业性特点反应到家庭教养实践中也将与劳工阶层有较大的不同^⑥。

职业类型对家长的养育行为具有影响作用的结论在得到一些学者印证的同时，部分学者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扩展性研究，认为不同的工作特征也会促使个体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取向，进而影响其教养方式。那些倾向于采取权威性教养方式的家长，通常在职场中也从事较为复杂或对自主能力要求较高的工作。而在管理相对严格的职场环境中从事着以重复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作的家长，往往倾向于采取专制型教养方式。此外，有学者发现职业特征对教养方式上的影响还具有一定的性别差异，如母亲工作的复杂性有助于形成温暖性的教养行为，父亲从事复杂性或自主性较高的工作则有助于父亲给予孩子更积极的回应，避免过于专制的教养行为^⑦。

工作与家庭的研究一度被视为社会学独立的分支学科，随着女性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研究者逐渐注意到工作与家庭角色之间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从工作—家庭冲突视角探讨家庭抚养子女的问题。在诸多研究中，溢出理论得到了普遍关注，其基本观点是工作环境中个体承受的压力以及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其家庭生活。运用到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中，学者们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结论：一方面，工作压力对家庭教养具有不良的影响，因长时间工作的压力而产生的负面感受，促使家长在与孩子进行互动时表现出行为与情绪上的退缩，更倾向于使用惩戒性手段和专制型教养方式，进而影响亲子关系^⑧。另一方面，较好的工作经历有助于家庭的抚养行为，家长因为在工作中获得奖励和满足感而产生的正面感受，有助于其在与孩子互动中更加有耐心，较少采取惩戒性手段，从而有利于形成较好的亲子关系^⑨。

3. 家庭收入

作为阶层划分的重要指标之一，家庭经济收入一直被作为研究家庭行为特征的重要变量。学术界最早将教养方式与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相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贫困问题的研究之中，分析贫困、低收入等经济状况对家庭养育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源于贫困家庭儿童发展机制研究的家庭压力模型与家庭投资模型影响较大。

家庭压力模型认为父母经济收入低造成的家庭经济压力不仅会给父母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且会对其教养行为产生消极作用，具体表现为父母自身容易情绪暴躁，对孩子的关爱程度和日常参与程度相对较少，由此容易给孩子带来消极影响^⑩。一些实证研究对此理论进行了论证，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其家长心理压力也较大，在家庭

教养方面倾向于采取专制型教养方式^⑤。

与家庭压力模型侧重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经济收入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机制不同，家庭投资模型则主要从“资本”视角探讨高收入家庭在教育过程中所具有的投资性优势。早期家庭投资模型关注的主要是对孩子的经济性投资，如给孩子购买学习资料、购买教育服务、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环境等。随后不断有学者注意到家长对孩子陪伴时间的投入，认为家庭收入较低的家庭由于家长从事的多为非标准工作时间和非弹性日程的工作，因此较少有充沛的时间用于陪伴孩子，难以进行密集型教养^⑥。实证性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指出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往往其认知刺激环境的能力也较差，能够提供给孩子的照顾时间以及亲子活动也相对较少^⑦。

综上所述，家庭压力模型与家庭投资模型均表明家庭收入较低的状况对家庭养育子女具有不良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的是因收入较低造成的家长心理健康等问题，进而产生不同的教养行为；后者则直接分析家庭收入对家长养育过程中投资行为的限制。

4. 家长流动方向

与布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强调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不同，索罗金、李赛特等从社会流动理论出发，将教养方式的形成视为一种同时具有继承性和理性选择的过程。他们认为父母的流动经历有助于其对教养方式的理性选择，流动的方向也会影响其对自身家庭教养方式的判断，因此教养方式虽然具有阶层继承性，但同时也会呈现出非对称性的特征^⑧。

(二) 其他相关影响因素

1. “爱子”背后相异的驱动力表现

当下和未来的幸福是父母对孩子关心的两个主要方面，包括父母教养方式在内的所有教养行为都反映了其对这两个不同方面的权衡。相关学者根据父母对孩子的爱所具有的不同驱动力将其分为：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利他主义的父母对孩子完全共情，即接受孩子自己认为的什么对他们有益的观点，而非强加给孩子父母的观点；父爱主义的父母则更加关注从成年人的视角权衡孩子行为的利弊。完全利他主义的家长通常是履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家长，完全父爱主义的家长通常是履行密集型教育的家长^⑨。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只出于一种特定驱动力的家长，无论是利他主义还是父爱主义经常是两种力量不同程度地同时体现在父母身上，只是

表现程度的多少不同。

2. 经济社会的平等程度

家庭教养子女的过程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分歧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当下乐趣”与“未来投资”间的关系，在二者进行权衡决策的过程中，与孩子倾向于眼前的满足不同，作为理性人的父母通常更加关注孩子的未来^⑩。其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等程度是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因素。从理性角度看，父母对子女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时，势必会考虑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是否值得。在一个工资收入差异化较低、蓝领工人也具有较高地位的社会中，父母通常不会太担心孩子的受教育程度，这时宽松的教育容易被社会接受，整个社会放任型教养方式较为普遍。与之相反，在过于看重学历文凭和教育回报率较高的社会，家长就会有很强的动机敦促孩子学习，并倾向于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

3. 成本与收益

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认为有必要引导孩子，但具体实施的教养策略却有不同。有的倾向于采用强迫型手段，即禁止某种行为或让孩子必须从事某种职业的专断性教养方式；有的是通过劝说，即父母试图通过塑造孩子的价值观与行为偏好，来促使孩子可以自愿去做与父母所希望的选择相一致的决定，属于权威型教养方式。从经济学视角看，当这两种教养方式并不存在明显好坏时，教养方式的选择将取决于父母对成本与收益间的权衡。比如，专断性家长需要花时间和精力督促孩子，而权威性父母也需要努力给自己的孩子灌输某种观念。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除了经济性投入外，父母在育儿实践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助于人力资本形成的另一种重要投入，家庭教养方式及其教养实践与具体育儿行为不仅对儿童认知能力、社会情感以及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且常被学者作为分析家庭教育非经济性投入的指标。基于教养方式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影响教养方式的相关因素，通过梳理文献可知，目前学者较为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社会阶层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分析路径可以归结为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两种。

结构主义分析路径主要是从整体上理解阶层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更多表现为阶层差异对家庭教养方式及其实践的直接影响，缺乏对差异化阶层

教养方式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对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要素的具体效应辨别不清。与之相反,个体主义分析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主义路径的这一缺陷,通过家长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以及流动方向等指标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分析,为深入理解阶层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经验,有利于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要素对教养方式的影响。然而,在个体主义分析路径中,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平均效应,较少关注阶层内部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对造成同一阶层的父母群体表现出相异的教养方式的宏微观机制研究不够深入。

除了关注阶层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外,也有学者从其他维度提出了可能影响家庭教养方式及其教养实践的相关因素,但由于目前这些研究多分散于不同学科领域,融合性和交叉性相对不足,距离构建具有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尚有距离^⑥。此外,现有研究多是运用截面数据从微观层面的家庭经济地位对家庭教养方式及其实践的影响分析^⑧,较少运用跨期混合数据研究社会经济不平等、教育竞争激烈程度以及政府财政地区性差异等宏观因素对教养方式阶层分化的影响^⑨。

四、研究述评与展望

(一) 简要小结

本文对家庭教育投入的概念内涵和分析维度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发现社会阶层地位作为个体或家庭禀赋,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重要的影响^⑩,这一发现也为研究者进一步从社会阶层视角分析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经验,有利于比较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要素如家长教育程度、家长职业、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社会资本、流动的方向等不同变量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然而,目前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依旧存在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分析维度单一以及对家庭教育投入差异化形成的内在机制分析不足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从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分析维度上看,现有研究较为单一且静态^⑪,要么是强调家庭的经济资本,通过分析家庭教育上的经济性支出,认为家庭教育投入受到父母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阶层特征影响^⑫;要么是侧重

于家庭的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通过分析家庭教养实践行为,强调教养方式的选择对家庭教育投入的作用^⑬,较少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探索家庭资本整体对不同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第二,从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分析视角上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阶层分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资本等个体化因素对其家庭教育投入选择上的影响以及家庭教育投入阶层化差异对教育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⑭,较少将收入不平等、教育竞争强度、公共教育财政供给等宏观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目前有关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主要以量化分析为主^⑮,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很多学者只能选取一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其整体和全面性把握相对欠缺。因此对于家庭教育投入显示出怎样的阶层内群体差异,其通过哪种机制运作等仍有待深入探讨^⑯。

第四,从研究数据的选择上看,相关调查研究主要以地方性、小样本为主,不能真实反映总体人口特征。近年来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的研究陆续增多,但通常使用的是某一年的横截面数据,一些无法观测的因素对因变量造成的影响难以识别,造成统计误差。

(二) 未来展望

基于新时期家庭教育投入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采用组合视角对家庭教育投入进行更加全面、整合性、历时性、动态性的描述,分析新时期我国家庭教育投入所具有的总体性、结构性特征以及投入偏好的历时性变化;第二,采用具有全国性的跨期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可以准确反映当前家庭教育投入总体状况的结论;第三,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对家庭教育投入的机制与过程做更为细致的考量,对比不同阶层家庭在教育经济性支出和非经济性教育投入上的异质性,分析家庭资本的累计与转变在不同阶层间影响其家庭教育投入的内在机制,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注释:

①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

② 谢倩、吴亚凡:《家庭教育投入研究进展述评》,

《湖湘论坛》2014年第6期。

③ 温海滢、李普亮：《中国城乡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研究述评》，《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④ 卢春天、李一飞、陈玲：《情感投入还是经济支持：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⑤ [美] 保罗·阿特瓦尔、[美] 凯瑟琳·S·纽曼主编：《日益加大的差距：世界各地的教育不公平》，张兵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页。

⑥③⑥ 涂瑞珍、林荣日：《上海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及教育负担状况的调查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1期。

⑦ 楚红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分布的不均等水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⑧⑩⑩ 李一：《中产阶层家庭参加辅导班教养实践分析》，《青年研究》2018年第5期。

⑨ 迟巍等：《我国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17页。

⑩ 戴耀华、关宏岩：《儿童早期综合发展》，载2007年第七届全国（内地、港、澳）“儿童发育与行为科学”研讨会论文集。

⑪ 李波：《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的视角》，《教育与经济》2018年第3期。

⑫⑩⑩ 田丰：《阶层教养方式述评：拉鲁框架与中国社会》，《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⑬⑭⑮⑯⑰ 陈陈：《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透视》，《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⑰ 刘保中：《“鸿沟”与“鄙视链”：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基于北上广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⑱ 刘浩：《中国家庭教养实践与阶层分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⑲ 洪岩璧、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⑳ 王家源、焦以璇：《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公平迈上新台阶，教育服务国家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目标如期实现》，《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2日。

㉑⑳ 万相昱、唐亮、张晨：《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的关联分析——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劳动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㉒ 刘保中：《家庭教育投入：期望、投资与参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页。

㉓⑳ 谷宏伟、杨秋平：《收入、期望与教育支出：对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㉔⑳ 李亚伟、刘晓瑞：《我国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17期。

㉕ 余红玲、万俊毅：《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变动成因探析——以广东省为例》，《中国农学报》2012年第2期。

㉖ 丁小浩、翁秋怡：《权力资本与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3期。

㉗ [美] 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陈耿宣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6—47页。

㉘ 龚继红、钟涨宝：《农村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随州市农村家庭的调查》，《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9期。

㉙⑳⑳ 吴强：《家庭收入和特征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㉚⑳⑳ 王远伟：《个人家庭教育投入及其社会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

㉛ 叶华、吴晓刚：《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

㉜ 李通屏：《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城乡差异分析》，《社会》2002年第7期。

㉝ 李红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实证研究》，《教育与经济》2000年第4期。

㉞ 沈百富、颜建超：《我国公共教育支出与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问题研究》，《上海教育科研》2012年第10期。

㉟ 魏晓燕：《公共教育投入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实证研究》，《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2期。

㊱ 孙敏：《政府教育投资对私人教育投资的引导效应分析——基于我国政府1978—2008年教育财政支出的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9年第3期。

㊲ 袁诚、张磊、曾颖：《地方教育投入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家庭动态重复截面数据的一个估计》，《经济动态》2013年第3期。

㊳ 胡瑞文、崔海丽：《2018教育发展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211页。

㊴ 杨东平：《2020：中国教育改革方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㊵ 刘黎明：《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现代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影响》，《教育现代化》2014年第1期。

㊶ 朱美静：《西方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研究述评》，《外国教育研究》2019年第11期。

④⑨ 蒋逸民：《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10 页。

⑤⑩ [美] 拉鲁·安妮特：《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0—65 页。

⑤⑪ [美] 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王水雄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3—42 页。

⑤⑫ 李骏、张陈陈：《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基于不同数据和测量的交叉验证》，《学术月刊》2021 年第 2 期。

⑤⑬ 许殷宏、朱俐嬛：《社会阶级与家庭教养之探究——以两个家庭个案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4 年第 3 期。

⑤⑭ 吴莹、张艳宁：《“玩耍”中的阶层区隔——城市不同阶层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民族教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⑤⑮⑯ 刘程、廖桂村：《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及其后果：国外研究进展与反思》，《外国教育研究》2019 年第 11 期。

⑤⑰ 王晓阳：《国外关于不同阶层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5 期。

⑥⑰⑱ 廖青、肖廷：《西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路径方法述评》，《外国教育研究》2017 年第 10 期。

⑥⑲⑳ 蓝佩嘉：《做父母做阶级：亲职叙事、教养实践与阶级不平等》，《台湾社会科学研究》2014 年第 6 期。

⑥㉑ 李珊珊、文军：《“密集型育儿”：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实践及其反思》，《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3 期。

⑥㉒ 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

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

⑥㉓ [美] 马赛厄斯·德普克、[美]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爱、金钱和孩子》，吴娴、鲁敏儿译，格致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6—108 页。

⑥㉔ 刘保中：《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入状况的比较研究：基于 CFPS（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7 年第 12 期。

⑥㉕ 李佳丽、张民选：《收入不平等、教育竞争和家庭教育投入方式选择》，《教育研究》2020 年第 8 期。

⑥㉖ [美] 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刘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35 页。

⑥㉗ 蔡玲：《育儿差距：家庭教养方式的实践与分化》，《青年探索》2021 年第 3 期。

⑥㉘ 蔡玲：《异质的中产阶层：理想类型与“双重”行为逻辑》，《社会科学动态》2021 年第 10 期。

⑥㉙ [美] 劳伦·A·里韦拉：《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江涛、李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6—80 页。

⑥㉚ 蓝佩嘉：《拼教养：全球化、亲职焦虑与不平等同年》，春山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2—150 页。

⑥㉛ 沈洪成：《激活优势：家长主义浪潮下家长参与的群体差异》，《社会》2020 年第 2 期。

⑥㉜ 吴重涵、张俊、王梅露：《家长参与的力量——家庭资本、家校合作与儿童成长》，《教育学术月刊》2014 年第 3 期。

作者简介：蔡玲，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武汉大学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辰 曦）